

明代科举的坚实基础

——官学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郭培贵

提 要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而作为其坚实基础的官学教育也达到了空前完备的状态,不仅地方府州县和军队都司卫所儒学教育空前发达、中央并设两京国子监且规模巨大、学校教育体系空前完备,而且还具有完全以科举为轴心并与其融为一体、学校功名成为科举功名的重要补充、监生入仕成为定制等鲜明特点;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吸引力,不仅成为明代科举的强力支撑,而且对明代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奠定了清代科举与官学教育的基础。明代官学教育上述特点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明代统治者始终把兴学置于“治国之本”的地位、注重其制度建设并予以切实的经费保障等原因。但由于官学教育完全处于政治统治的附庸地位,故也带来了教学内容狭窄和明中叶后渐失教育之实而越来越成为朝廷牢笼甚至摧残人才的工具等负面影响。

关键词 明代科举 官学教育 监生

明代科举处于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而作为其坚实基础的官办学校教育^①,无论制度建设,还是其实际的发展状态,也都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达到了空前完备、发达的程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学术界虽然已有了十分丰富的成果,^②但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科举与社会和谐研究——以明代为例”项目成果,批准号:07JA770006。

①本文所指“明代官办学校教育”,是指面向民间和军队子弟进行儒学教育的官办学校,具体而言,包括两京国子监和地方府、州、县、盐运司儒学以及军队都司、卫、所儒学,这是明朝官办学校的主体。至于两京武学和设于宫内专教宦官的内书堂以及京师官办语言学校四夷馆,因其皆属特殊性质的学校,且教育对象极为有限,故未纳入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②据笔者统计,关于明代官学教育的研究成果,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公开发表的论文达180余篇,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已有12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丁榕萍:《明代国子监教育与科举之研究》(台湾花莲:华光书局1975年),林丽月:《明代的国子监》(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8年6月初版),吴智和:《明代的儒学教官》(台北:台湾书局1991年3月初版),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蔡嘉麟:《明代的卫学教育》(《明史研究丛刊》之三,台湾宜兰:明史研究小组,2002年2月初版),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等。

有成果主要是从不同角度或不同侧面进行的研究,而罕见在总体上对明代官学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研究的成果,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

一 明代官学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

尽管自西汉就有了地方郡学和中央太学之设立,并在此后各代获得不断的发展,但只有到了明朝,才最终形成了健全、完备、完全向良民开放,并且与科举和选官融为一体的官办学校教育体系。其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地方和军队儒学教育空前发达。洪武二年,明太祖诏令全国府、州、县各设儒学,并很快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据笔者统计,至洪武末年,全国设置府 142 个、州 227 个、县 1063 个,总计 1433 个,而设置府、州、县学也分别达到 124、160 和 1027 所,总计为 1311 所,平均设学率为 91.49%;其中,直隶和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湖广、广东、北平、山东、江西、福建等 10 布政司的设学率都是 100%;而设有土司衙门的四川布政司也达到 96% 以上,这是前代未曾有过的;只有以土司衙门为主的云南、广西两省偏低,设学率分别为 27.78% 和 51.92%,但也与其它布政司一样,达到了当地儒学设置史上的最高水平;而若换一个角度,以单位人口平均拥有的学校数量来衡量,则边远地区省份又远远高于内地。^①

府、州、县学教育完全向良民开放,入学者都从本地官员军民子弟中选取其“端重俊秀者”而来,称为“生员”,俗成“秀才”。洪武二年,初定各学生员名额:府学四十人,州学 30 人,县学 20 人,因其都享受国家免费伙食的待遇,故又被称为“廩膳生员”,简称“廩生”。洪武二十年,随着求学者的日益增多,又令各学在廩生之外添设“增广生员”,不拘额数;宣德三年,确定各学“增广生员”的数额与“廩生”相同。依上标准,则全国廩、增生员总计至少在 68000 人以上。正统以后,适应求学者不断增加的情况,各学又增设“附学”生员,数量往往超过廩、增生员,甚至在其数倍之上^②。弘治时,全国府、州、县学各自拥有生员的数量大致平均在二百人上下^③,依此计,则全国生员当在三十万人左右;至明末,顾炎武估计全国生员“不下五十万”^④。生员不仅成为明代科举考生的主体

①对于洪武时期直隶和各省所属府、州、县与府、州、县儒学设置数的统计,皆以《明一统志》(《四库全书》第 472—473 册)所载为主要依据,参以各省、直方志及《明实录》等文献。其具体考证和统计过程详见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102—105 页。

②如赵子富先生统计万历《河间府志》所载该府 22 所儒学生员的数据资料,得出“各学生员总数为 3785 名,其中廩膳生员为 510 名,仅占生员总数的 13.47%”的结论;而在江南地区廩膳生员的比例就更低,“如按叶梦珠所言,上海一学有生员 650 余名,其廩膳生员 20 名,只有生员总数的 3.07%”。见《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1—82 页。

③据《明孝宗实录》卷 152“弘治十二年七月丁丑”条载,巡按贵州御史张淳奏言当时贵州有“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年校印本,第 2691 页)。依此计,则贵州每学平均有生员一百六十余人。考虑到当时贵州是全国学校教育发展的落后省份,则全国府、州、县学平均拥有生员当在二百人上下。

④[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 1《生员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2 页。

来源,^①而且成为明代社会富有特色的一个庞大而重要的群体,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影响。^②

各府、州、县学的教师也都有明确编制,分别为府学教授 1 员、训导 4 员;州学学正 1 员、训导 3 员;县学教谕 1 员、训导 2 员。据上述洪武末年全国所设府、州、县学数,则可知同期仅府、州、县学的教师编制就高达 4341 员。弘治初年,吏部尚书王恕奏称天下教官数量实际上是“五千有余”,^③大致占到了当时全国文官编制的四分之一。^④如此大规模的官学教师队伍,也是前代不曾有过的。

除上述府、州、县学作为地方儒学教育的主体外,明廷还在主要分布于辽东、北边、陕、甘、宁沿边和西南云、贵、川地区以及东部沿海的驻军中设置了 100 多个都司、卫、所儒学,^⑤以教育军队子弟。正统五年,在山西安邑县(今运城市)设立了“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儒学”,以教育该司所属人户子弟。^⑥这些学校也都是由官费出资,由吏部选任教官;其提督考较,正统以后也与各府、州、县学一样,统一由各省、直提学官负责,只有设于辽东、宣府、大同、甘肃等边远地区的卫学由当地的巡按御史或分巡官提督管理。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 69《选举一》载“科举必由学校”,即凡参加科举者必来自学校。这一说法长期流行,迄今仍被许多论著所引征;但它却是错误的。事实上,明代科举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少量“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这些在《明太祖实录》卷 160“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 2468 页)、万历《明会典》卷 77《科举》(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450 页)和诸多《进士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②关于明代生员群体及其对明代社会的影响,陈宝良曾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论文有《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史学集刊》2000 年第 2 期)、《明代生员新论》(《史学集刊》2001 年第 3 期)、《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之真面目》(《浙江学刊》2001 年第 3 期)、《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安徽史学》2002 年第 4 期)、《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明代生员层的社会职业流动及其影响》(《明清论丛》第三辑,2002 年 5 月)、《明代地方学校生员录取制度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明代生员及其相关概念辨析》(《浙江学刊》2003 年第 1 期)、《明代学校生员的别称与种类》(《中州学刊》2003 年第 2 期)、《明代地方学校生员考试制度考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明代生员与地方社会:以政治参与为例》(《明史研究》第 8 辑,2003 年),以上论文的主要内容都收入其《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

③[明]王恕:《王端毅奏议》卷 9《议给事中林廷玉陈言翊治奏状》,《四库全书》第 427 册,第 612 页上。

④[明]陈洪谟:《继世纪闻》卷 5 载:“正德以来,天下……文职二万四百余员”(中华书局 1985 年点校本,第 107 页)。因府、州、县学教官也属“文职”,依此计,则其占到了文职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⑤关于明代都司、卫、所儒学的研究成果,所见有金超:《明代宁夏儒学》(《宁夏教育》,1988 年第 3 期)、胡迅雷:《明代宁夏学校概况》(《宁夏教育》1988 年第 6 期)、魏若华:《明清时期中卫教育概况》(《宁夏教育》1989 年第 1—2 期)、陈宝良:《明代卫学发展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4 年第 6 期)等文,著作有台湾蔡嘉麟:《明代的卫学教育》和笔者《明史选举志考论》。其中,关于都司、卫、所儒学数量的统计,蔡著共考出 110 所,但其中有 2 所尚属“蠡测”所得,即还不确定。陈宝良《明代卫学发展述论》“在此基础上,又考出 2 所卫学”,达到 112 所;但其考出的“贵州敷勇卫学”,蔡著实已计入,属重复;考出的“六安卫学”,笔者查核其所据“万历《重修六安卫志》卷 4《职官志》”(实应为《秩官志》,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21 册,第 40 页),实无“六安卫学”之记载。另,笔者据《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 2006 年影印本,第 73 页)、《嘉靖二十年进士登科录》(第 50 页)和《钦定大清一统志》卷 318《四川·叙永厅·学校》,又考出贵州都司还设有“永宁卫学”,为蔡著所未载。故迄今真正“考实”的都司、卫、所儒学数应为 109 所,其中 80 余所设立于天顺之前,详见《明史选举志考论》一书,第 110—120 页。

⑥《明英宗实录》卷 70“正统五年八月戊寅”条,第 1353 页。

有明一代,朝廷始终稳定地举办如此完备和大规模的地方及军队儒学教育,前所未见,对于明王朝在全国普及儒学伦理道德的教化、提高全国民众文化素养特别是促进边远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巩固统一和培养统治人才,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其次,中央官学高度简化且规模巨大。唐代以来,中央官学为多学并立,国子监则是中央各学的行政管理机构。如唐代中央官学就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皆隶属国子监管理。^①宋代中央常设官学则有国子学、太学、广文馆、律学等,其他杂学废置无常,所有中央官学也“皆隶国子监”管理。^②元代国子监也是“掌国之教令”。^③明太祖则只设一所中央官学,这就是“国子学”,洪武十五年,又改称“国子监”。^④这样,国子监就由唐代以来中央官学的行政管理机构变成了纯粹的国立最高学府。这一变化,既减少了朝廷对中央官学的行政管理层次,又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可谓一举两得。洪武八年,增设中都国子学,十五年改称为中都国子监,二十六年罢设,其性质仅为南京国子学和国子监的分校。永乐元年,又增设北京国子监,由此形成南、北两京国子监并立的体制,且至明末再未发生变化。永乐二十年,两监在监监生高达一万五千余人,成化元年,更高达一万九千余人;^⑤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仅次于东汉太学,而其规范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东汉太学。

其三,官办儒学教育体系空前完备。洪武十六年,明廷确立了各府、州、县学向国子监举贡生员的制度,它在程序上包含两个环节:首先由各府、州、县学分别按照一定额数和标准向中央举贡生员;其次是贡赴至京的生员须参加翰林院主持的“廷试”,只有中式者方可入国子监肄业。^⑥因各学所贡生员是分年(岁)而贡,故被称为“岁贡生员”,简称“岁贡”。由此,“岁贡”成为明代国子监生的最主要来源。这不仅改变了明朝以前国家最高学府的学生主要来源于官宦子弟的局面,使明代的大学教育完全向民间开放;而且,也把地方儒学和中央国子监教育在制度上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空前稳定和严密的官办儒学教育体系。^⑦成化二年之前,都司、卫、所儒学的军生只可参加科举考试和依例袭职,不得岁贡;此后,也可与府、州、县学一样,按一定时间和定额岁贡生员并经廷试入监;^⑧从而,使学校教育体系的规模与基础又得到进一步扩大。

①《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159页。

②《宋史》卷157《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657页。

③《元史》卷87《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2193页。

④ 明朝国子学始设于朱元璋正式建国之前的乙巳年(1365年)九月初一,初以元朝集庆路学为之;因其規制狭小,故于洪武十四年四月又令改建于南京鸡鸣山下;次年三月,令国子学改称为国子监;五月,国子监建成;此后虽然又有多次续建或修缮,但终明之世南京国子监再未迁址,始终在鸡鸣山下。

⑤ 据[明]黄佐:《南雍志》卷15和[明]郭磐:《皇明太学志》卷12:永乐二十年,南监9972人,北监5300人;成化元年,南监6177人,北监13011人。又据[明]赵维贤、万丈彩等:《后湖志》卷2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为6055万。以此估计,永乐二十年全国人口至多不超过6500万,则当年监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应为万分之二强。

⑥《明太祖实录》卷152“洪武十六年二月丙申”条,第2388页。

⑦ 国子监教学内容与府、州、县儒学一样,也以儒学为主,故虽无儒学之名,而有儒学之实。

⑧ 万历《明会典》卷77《岁贡》,第446页。

其四,官办教育完全以科举为轴心。早在明太祖时期,明廷就已确定了中央国子监和地方府、州、县学从教学目的到教学内容都主要围绕科举考试进行的基本格局;^①同时,又明确规定“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为科举考生的主体来源。^②并对其中举者予以隆重表彰。如洪武十七年,监生多有中京闱者,太祖即令礼部“出榜”,于其“原籍去处张挂,着他乡里知道”,以“光显他父母”。^③次年“会试,国子生多在前列;上大喜。二十一年三月殿试,上以监生任亨泰廷对第一,召祭酒宋讷褒谕之,命撰《进士题名记》,立碑于监门”。^④由此,进士题名碑相继不绝。^⑤如此高规格的表彰和激励,再加进士优越的出路,自然就把国子监教育引导到以科举考试为轴心的轨道上。洪武二十六年,明廷又规定以各府、州、县学生员考中举人的数量作为考核教官的主要依据,更是以硬性的制度手段把府、州、县学教育限定在科举附庸的地位。

其五,学校功名成为科举功名的重要补充。明代的科举功名是空前完备的,除保留了前代的进士功名外,又增加了举人和庶吉士的功名。^⑥但明代对于功名体系的设计和发展并非就此止步,而是同时还确立了学校功名“生员”和“监生”,作为科举功名的重要补充,即士子只要获得“生员”和“监生”的身份,就成为终身固定的资格,并享有以下待遇:生员不仅在衣冠上与庶民有了明显区别,可享有“免其家二丁差徭”的优待,而且可充贡升入国子监成为监生,而监生不同于前代,则获得了当然的选官资格。所有这些,不仅大大增强了学校的吸引力,而且使学校成为科举落第者的收容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朝廷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其六,监生入仕成为定制。选拔太学生或国子生之优异者直接入仕,自汉以来,代不乏例,宋徽宗还曾一度以太学上舍生入仕完全取代科举考试。但总体说来,明代之前,国子生并未获得当然的入仕资格,由学校直接入仕在整个官员队伍中还是少量的。而到明代,监生入仕则成为常例,也即监生只要按规定完成了肄业和历事,就可获得选官的资格。洪武时期,监生就已成为朝廷选官的重要来源之一,有些还超擢为高级官员,如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一次就超擢监生刘政等65人分别为各省方面官。其中,13人分别为左、右布政使,17人分别为左、右参政,8人分别为左、右参议;5人为按察使,10人为副使,12人为僉事。^⑦永乐以后,岁贡和举人监生更成为朝廷选官的最主要来源,中叶后,更与进士

① 详见《明史选举志考论》,第23—26、107—109页。

② 万历《明会典》卷77《科举》,第450页。

③ 《南雍志》卷15《储养生徒之定制》,《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49册,第376页。

④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55《学校考·太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827页。

⑤ 《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77页。

⑥ 举人在前代仅仅是参加会试的资格,而且是一次性的,如果会试下第,下次再参加会试,就必须重新参加乡试,只有乡试中式再成为举人,才具有了再次参加会试的资格。但在明代,举人则成为终身的功名,不仅可以无限制地连续参加会试,而且获得入国子监选官的资格。明代创立的庶吉士选拔、培养和任用制度,则使庶吉士成为仅次于一甲进士的高级功名,仕途远优于二、三甲进士。

⑦ 《明太祖实录》卷230“洪武二十六年冬十月丙申”条,第3359—3360页。

一起构成了严格的选官资格体系。^①这对于提高官员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进一步扩大明朝的统治基础、增强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的凝聚力,皆具有重要意义。

在以国子监和府、州、县、都司、卫、所学为主体的儒学教育体系之外,明代还设有武学、宗学、社学、四夷馆、内书堂等学校,作为主体教育的重要补充。

二 明代学校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和经验教训

明代官学教育之所以取得了远迈前代的成就,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得益于统治者对兴办教育的高度重视。早在建国之初,明太祖就强调“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②。从而,把兴学重教置于“治国之本”的地位。这一思想始终成为明朝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理念和基本国策之一,影响巨大。其二,继承前代教育发展的成果。中国具有兴学重教的悠久传统,自汉代就开始形成的以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学为主体的官办儒学教育,经历代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府、州、县学,其办学条件和制度建设都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状态;而明代学校的发展正是根植于这个深厚的基础之上。其三,注重制度建设。为强化对学校教育的管理,早在洪武时期,明廷就制定了一系列健全、完备的规章制度,如国子监《学规》“五十六款”、《学校禁例十二条》、地方官朔望视学制度以及府、州、县学岁贡制度等等,都成为明代“祖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又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完善和增定各种制度,如在明中后期学校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子监监生坐监制度、历事制度以及地方和军队儒学的岁贡制度、提学制度等就先后经过多次修订,从而保证了学校教育能够大致在朝廷划定的轨道上规范、有序运行。其四,对兴学给予切实的经费保障,如洪武十五年定天下府、州、县学粮为三等:“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应天府学一千六百石。各设吏一人,以司出纳。师生月给廩米一石,教官俸如旧”。^③从而把地方儒学的办学经费纳入国家财政的正常开支范围之内。明中叶后,各学又普遍增置学田,进一步增强了办学的经济实力。^④当然,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实施,也与空前发展的明代经济所能提供的物质支持有直接关系。

① 永乐至景泰时期,全国府、州、县学每年平均向国子监推荐“岁贡生员”约900余人,会试下第举人每年入监平均约百余人左右,则每年岁贡和举人入监约有千人,监生每年出监选官者也应在千人左右。而进士自永乐二年至景泰二年共举行十七科,共取进士2990人,平均每科176人;按常例,这170余名进士应在三年内选用完毕,则每年进士选官者平均应为60人。依此计,则举、贡监生选官在数量上应是进士的十几倍以上。景泰以后,国子监增加大量纳贡生,嘉靖后又增加大量的例监生,则监生相对于进士的选官倍数比景泰前还应更高些。但明中叶后,监生选充的只能是中下级官职,而高级和重要官职则非进士莫能属。

② 《明太祖实录》卷46“洪武二年十月辛巳”条,第924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144“洪武十五年夏四月丙戌”条,第2264页。

④ 赵子富先生以吴县、长洲、昆山、吴江四县学在明中后期陆续拥有的学田为考察对象,得出以上四学所得“私人捐助田共有418亩,公费田为1924亩,私人捐助田只占学田总数的17.84%”的统计数字,进而得出明代中后期府、州、县学“在学田的设置上,公费仍占主要地位”的结论。见《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9页。

明代官学教育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它始终完全作为政治统治的附庸而存在。尽管这一局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共有特点,而非明代教育所独有,但明代却把它发展到空前的程度,集中表现在从办学目的到学校从事的所有事务和活动,都是处在朝廷的绝对控制之下,唯以思想教化和加强统治为目标。这固然有利于朝廷对士子进行思想控制,但也给明代教育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教学内容狭窄。无论府、州、县、卫、所儒学,还是国子监,都完全围绕思想教化特别是科举考试开设课程,除传统算学之外的科技内容完全被逐出学校教育之外;即使算学,由于不属科举考试科目,实际上也长期处于被冷置的地位。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二是名为育才,逐渐变为摧残人才。明中叶后,学校教育日趋名存实亡,越来越变为朝廷单纯牢笼士子的工具,如弘治十七年,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奏言:

岁贡诸生,先在各处府、州、县学为附学,为增广,亦既有年,然后得廪;其廪膳必二十余年,或三十年而后得贡;迨贡入国学,远者十余年,近亦三五年而后拔历;又历事一年而挂选;通计前后年数已五六十岁;又待选十余年而后得官;则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①

可知,随着明中叶后仕途的日趋壅塞,士子通过学校一途入仕所耗费的时间被越拉越长,不仅一代又一代士子的青春年华被消磨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而且有不少人未至选官即已死去。因此,从长远看,这种教育与其说是培养人才,倒不如说是摧残和扼杀人才;与其说对当时社会起了稳定的作用,倒不如说对当时社会起了凝固和僵化的作用。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到明后期开始出现由强盛发达转向落后衰弱的迹象,无疑与明代教育的上述缺陷和负面影响具有一定关系。

(作者通讯地址:郭培贵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16029)

(责任编辑 晓宁)

^① [明]章懋:《枫山集》卷1《举本监弊政疏》,四库全书本,第1254册,第10页。